

巴金《海行杂记》手稿的故事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巴金的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达1300万字。他的文学之旅并非一蹴而就，其起点可追溯至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海行杂记》。

1927年1月15日，23岁的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了“昂热号”邮轮，前往法国留学。34天的航行途中，巴金开始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些记录成为了《海行杂记》38则的雏形，它们不仅是对旅途的记录，更是巴金内心世界的抒发。

巴金创作《海行杂记》的初衷，是为了纪念他的大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大哥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巴金自幼在旧家庭中感受到压抑和束缚，而大哥是他在这个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与支持。他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让大哥了解他在海上的经历，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我为我

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巴金在《海行杂记》里说。

抵达法国巴黎后，巴金继续对这些记录进行增补和完善，使《海行杂记》的内容更加丰富。1927年10月19日，巴金完成了《海行杂记》的初稿，并在当天写下了自序。

随后，他将手稿寄给了在北平念书的三哥李尧林。在那个通信不便、书籍珍贵的年代，手稿成为了巴金与三哥之间传递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纽带。

三哥收到手稿后，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阅读着弟弟的文字，他能从这些手稿中感受到巴金在航海途中的艰辛与收获，以及巴金在文学创作上日益成熟风格。三哥李尧林深知大哥李尧枚对巴金的关心与牵挂，也明

白这份手稿对于大哥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很快将手稿转寄给了在成都的大哥李尧枚。

在《海行杂记》的手稿中，巴金多次表达了对哥哥们的思念和感激之情。他在文中回忆了与哥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温暖的时光成为了他在旅途中最珍贵的回忆。在手稿的最后，巴金以他那热烈的笔触写道：“在这本小册的后面恰巧发现了两封信，这是三哥在我临行前的几天寄我的，当时放在大衣的袋里，到了巴黎后不知怎么又放在这本小书里面。现在写到最后，看见这信很感动，就把他们贴在后面，做一个纪念。”

1993年9月8日巴金将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右侧扉页还用蓝色钢笔字写着：献给我亲爱的哥哥和三哥。

(摘自2月20日《人民政协报》王雪文)



邓稼先与音乐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回忆，那会儿邓稼先很爱唱歌，常常唱《欢乐颂》，他会用德文、俄文、英文三种语言唱这首歌。《欢乐颂》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此曲最经典的版本应为德文版。当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见左图），放弃了导师为他选择的深造之路，前往德国继续学习。

邓稼先对交响乐的热爱渗透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在紧张工作之时，或做重大决策之前，他的房间里经常会响起《田园交响曲》等交响乐的旋律。许鹿希记得，一天晚饭后，邓稼先一改往日的习惯，没有听《田园交响曲》，而是换上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一年，39岁的邓稼先带领团队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第二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在邓稼先位于四川绵阳的简陋的住所里有一台留声机（见右图）。据跟随邓稼先多年的工作人员游泽华说，当时月薪两百多元的邓稼先回北京上街买书时，总要买上一些唱片。他清晰地记得，在空旷山野的夏夜中，邓稼先躺在床上，反复聆听莫扎特的《小夜曲》。

有一张1985年6月26日的收据，开具日期距邓稼先去世只有一年。这张有邓稼先亲笔签名的单据被二机部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职工张建钢留存至今。他清楚记得，那天他从成

都买书归来，作为九院院长的邓稼先不仅自费给他开票，还与同是音乐爱好者的他一起欣赏了新买的唱片。

张建钢特意为邓稼先放了交响乐，并谈起西方音乐。不料邓稼先突然问他是否有中国音乐，并告诉他，《梁祝》《二泉映月》《茉莉花》等中国音乐很好听。当黑胶唱片里传出《茉莉花》婉转的乐声时，张建钢看见邓稼先眯缝起双眼，仿佛陶醉在音乐里。张建钢后来回想，祖籍安徽怀宁的邓稼先，从小肯定没少听《茉莉花》这首经典民歌。

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曾说过，假如有一天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中国男儿》。这是五四时期一首铿锵有力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殷红。”（摘自1月17日《光明日报》李黎文）

2016年3月6日，在中国“央广网”的报道中写到，“中国的‘熊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室赠送的一对熊猫”。此说法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甚至也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媒体《日经ビジネス》就在2017年7月14日题为“取得实现中国梦成果的熊猫外交”的报道中记载了同样的内容。有趣的是，两则报道都表示此内容引述自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网站于2016年3月4日发布的新闻。

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题为“乐宝、爱宝熊猫夫妻得到研修签证来韩”的一篇报道与熊猫有关，但是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猫给日本的内容。反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

武则天“熊猫外交”真伪考

网站中找到了一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送出熊猫为‘熊猫外交’起源”的报道。但是此篇报道记者徐尤振却没有在文中给出此说法的任何依据与信息来源。

打开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中文版）对“熊猫外交”的词条，提到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说法最早是出自胡锦矗的考证。而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理由，胡锦矗在其著作《大熊猫研究》中写道：

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唐代，我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对产地称为白熊（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

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活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

查找古代典籍，大熊猫虽有“貔貅、貘、驺虞、食铁兽”等多种不同称呼，但却从未有过“白熊”的别称。

直至近代，虽然曾在一段时期内“白熊”确实作为大熊猫的别称出现过，但并不能因为四川一些当地人把大熊猫称为“白熊”，就将“白熊”或“白罴”认定为大熊猫。

按照胡锦矗的说法，该说法是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年鉴》。可是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查找资料后发现，此一说法或是出自于德国

记者赫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动物发现史》。书中这样写道：

译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熊，早在唐朝初代皇帝在位期间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有记载。之后根据日本的《皇室年代记》记载，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赠送了两只活的白熊和70张白熊皮。

赫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本名为《皇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公元685年中国皇帝赠送给了日本皇帝两头活的白熊与70张熊皮。关于《皇室年代记》，赫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翻译为《日本皇家纪年》

第一部百科全书

1751年，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出版了《百科全书》这部巨著，并提出了百科全书的概念，将其命名为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是囊括当时所有知识的汇编，但这部著作绝不是第一部符合这个定义的工具书。

至于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是早1725年，即早于狄德罗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就有一部非常庞大的汇编广为流传，那就是85.2万页的万卷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在许多方面，这部巨著都与当时西方人的构思类似。虽然书中收录了许多神话和传说，还有许多关于龙和七巧板的内容，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远比人们想象的多。

对普通西方人来说，如此庞大的知识库必然作用有限。该书过于专注于中国及其属地，而且过于随意地将事实和寓言混为一谈，因此并不完全可靠。然而，作为一项事业，它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是努力和奉献的黄金标准。

在更早的10世纪，有一部用希腊语编写的准百科全书，即《苏达辞书》，其名称在拜占庭希腊语中意为“堡垒”。实际上，它更像一部介于字典和百科全书之间的词典。它包含的定义或微型文章的总量多达约3万。《苏达辞书》的意义还在于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词条，涉及的人物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博学家之一，即米利都的亚历山大。

德国也可能拥有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并以此命名。约翰·海因里希·阿尔施泰德是一位来自黑森的加尔文派牧师，阿尔施泰德耗费30年时间编纂一套七卷本的《简明百科全书》，最终于1630年完成。他

称这部作品是“对人们一生中应该学习的所有知识的系统梳理，简而言之，它是知识大全”。这部百科全书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开始为人所知。科顿·马瑟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早期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煽动性的传教士。他倡导使用这套七卷本的《简明百科全书》，尽管这部作品从未在学术界之外获得真正的影响力。

最早以包罗万象的总汇形式介绍现在和过去所有知识的英文汇编有两部，均出版于伦敦。第一部由英国作家约翰·哈里斯于1704年编成出版；第二部于1721年出版，编纂者是英国作家伊弗雷姆·钱伯斯。他在当时书店发布的告示中宣称，这些卷册共同组成了《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字典》。如果两人存在竞争关系的话，那钱伯斯起步比哈里斯晚了近20年，但还是赢得了这场竞赛，作为“现代百科全书之父”而名垂史册。他编纂的百科全书获得了评论界的认可，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这部百科全书的意大利语译本共九卷，法语版于1744年问世。钱伯斯无缘得见（钱伯斯于1740年去世），法国评论家、哲学家狄德罗在巴黎阅读了这部百科全书，受到其结构和范围的启发，并决定进一步完善它。在这个过程中，狄德罗成了世界上最常与百科全书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在巴黎，人们至今仍然坚称狄德罗编写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尤其是因为他给这部工具书取的全名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摘自[英]西蒙·温切斯特著孙亚南译《知识的进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日本帝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所说的《皇家年鉴》一书。

不过赫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武则天与天武天皇，所赠送的动物也不是大熊猫而是白熊。如果说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间，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帝认为是天武天皇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将中国皇帝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随意。

诚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握有实权，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唐睿宗李旦，称武则天为“太后、皇太后”。所以此一时期的对外交流使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只可能是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摘自2月23日澎湃新闻 刘洋文）